

西北联大与陕甘宁边区高等教育比较研究

梁严冰

(西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西北联大与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都为中国高等教育史增添了光辉篇章,并对新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共同之处是都在抗战的烽火中组建、创办与发展;共同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布局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并为抗日战争与民族解放造就与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西北联大与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在办学过程中形成了各自鲜明的特点:西北联大在教学中高度重视对西北地区经济社会的考察与调研;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则强调教育为生产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的结合;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一显著特点是始终坚持“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且边区高等教育在教育教学中把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放在首位。

关键词:抗日战争;西北联大;陕甘宁边区;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975(2017)05-0041-08

收稿日期: 2017-08-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北联合大学史研究”(17BZS019)

作者简介: 梁严冰(1970—),男,陕西延川人,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西北联大与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都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为保证中国高等教育弦歌不辍和满足全民族抗日战争的需要,及谋求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而创办的高等教育。以往研究分别从西北联大的组建分置及根据地高等教育的创办、发展做了一些探讨和梳理。^①但是,比较研究相对缺乏。对二者进行较深入地比较,认真汲取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办学治学经验,遵循教育规律,对于推进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西北联大与陕甘宁边区高等教育的共同之处

(一) 都在抗战的烽火中组建、创办与发展

西北联大的组建与分置。1937年7月7日,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有意识地以大学为破坏与轰炸目标,意在彻底摧毁我国的民族文化命脉,各大学因之损失惨重。如1937年7月29日,日军对天津持续4个小时的大轰炸,便以南开大学为主要目标。抗战爆发后的一年中,全国108所专科以上学校,有91所受到日军破坏,其中25所破坏严重被迫停办。学生数由战前的41922人锐减到31188人,减少了10734人。^[1]面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严峻形势,国民政府教育部采取紧急措施,组织高等学校向后方大迁移,在西北、西南建立中国新的教育基地。1937年9月10日,以部16696号令:以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础合组西安临时大学,迁设西安。^{[2][43]}

^①相关研究参见戴志贤、李良志《抗日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日本)大塚丰《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胡国台《浴火重生: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台北稻乡出版社,2004年版;张岂之《西北联大与开发西北:中国高教史上的重要篇章》,《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0月15日;方光华《为什么要纪念西北联大》,《西北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姚远《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分合及其历史意义》,《西北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梁严冰《西北联大与抗战时期的西北战略》,《西北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梁严冰《西北联大的组建与分置》,《光明日报》2012年10月14日;梁严冰、方光华《抗日战争与中国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2015年第10期;梁严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高等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党的文献》2017年第2期;曲土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高等教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陈平原《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

10月18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正式开学,11月15日开始上课。当时全校设文理、法商、教育、工、农、医6大学院,23系,共有学生1472人,其中311人为在西安两次招收之新生,余皆为三院校原有学生或他校旧生转学而来。^{[2]44-45}西安临时大学的成立,正如临大校刊发刊词所言“临大合平大、师大、北洋极有历史之3院校,经过不少之曲折历程,始在西北重镇宣告成立,在教育史上实一创举。”^[3]

随着战事的进一步扩大化,尤其是1937年11月9日太原失守后,西安东大门告急。在此情况下,国民政府命令西安临大再迁汉中。1938年3月6日,西安临大正式离开西安,之后渡渭河、翻秦岭,到达陕南汉中。同年4月教育部关于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指出“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原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各院系逐渐向陕甘一带移布,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院系仍旧。”^[4]到达汉中后,1938年5月2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在校本部城固县举行开学典礼,学校常委陈剑脩报告更改校名的意义时说“本校现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其意义一方面是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一方面表示原由三校院合组而成。”^{[2]52}李书田在回忆一月有余的南迁过程时,充满激情地讲“全体师生徒步跋涉近千里的路程,过渭河,越秦岭,渡柴关,涉凤岭,从事这样的长途旅行,在我们学界,确是破天荒的大举动。”^[5]1938年7月,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令西北联大工学院、农学院独立设校。同月,教育部又令师范学院独立设置,并规定设教育、体育、国文、史地、数学、理化、英语、家政8系及劳作专修科。^[6]1939年8月,西北联大再次改组,文、理、法商3学院组建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独立设置,称国立西北医学院;师范学院独立设置,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西北联大从而有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5校。抗战胜利后,与西南联大几乎全部北归不同的是,西北联大除原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迁回原址复校外,主体及其他从母体中分离出来院校永留西北。^[7]为现代西北高等教育奠定了基础、确定了基本轮廓。

在西北联大组建、分置的同时,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从无到有、不断发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之前,陕甘宁地区文化教育十分落后。1936年7月,边区首任教育厅长徐特立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讲述当地教育状况时说“在西北,在我们到达以前,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认识字。文盲几乎达到95%

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角落。”^[8]卢沟桥事变后,由于形势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其中,建立与实施高等教育,给学生以较高级的专门教育,培养大批优秀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人才,成为当时中共最为重要的战略之一。为此,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在陕甘宁边区陆续创办了10多所各类高等院校,由此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创办高等教育的先河。

早在1937年1月20日,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一、二科)即从志丹迁至延安,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抗大的办学目的是培养抗战中的军事政治领导干部。同年3月2日,抗大第二期举行了开学典礼,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莅会讲话,勉励学员努力学习军事政治,以担负起抗日救国的伟大使命。8月1日,抗大第三期在延安开学,本期共招收学员1372人,编为3个大队。^{[9]27}继“抗大”成立后,1937年7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并委托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张云逸等负责筹备工作。11月1日,陕北公学在延安举行了开学典礼。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目前的时局》的演讲,他指出“陕北公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的任务。”^{[10]287}号召大家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实现民族抗战。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该院的宗旨是“培养抗战艺术干部,研究正确的艺术理论;整理中国艺术遗产,建立中国新的艺术。”1939年2月,该院成立了普通部、专修部和研究部等3个部。从1938年4月至1943年4月,鲁艺共招收4期学员,毕业学生502人。1943年4月该院并入延安大学。^{[9]39}1938年5月5日,马列学院在延安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高等院校,对全党培养高素质的马列主义人才意义重大,张闻天兼任院长。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经常到学校为学员讲课或作报告。1939年7月10日,中国女子大学经过数月筹备后在延安举行了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出席并发表讲话。毛泽东指出“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他还强调“假若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11]106}1940年5月3日,以主要培养具有较高水平和独立工作能力,又熟悉从事青年运动干部为任务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在延安成立,陈云担任校长,学校分设6个班,该校1941年9月与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等一起并入延安大学。1940年7月1日,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成立,学院旨在培养政治坚定、廉洁奉公的新民主主义的行政工作干部。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

兼任院长。1942年3月29日,中共西北局常委会确定其教育方针所遵循的三原则为:一、学习课目要与政府工作沟通;二、学习课目要与社会现实沟通;三、学习程序由具体到理论。^{[11]227}1944年5月,边区根据中共西北局的决定,行政学院并入延安大学。1940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农综合性大学——延安自然科学学院举行开学典礼并正式上课。院长李富春代表党中央作题为《自然科学院》的报告。学院分本科(大学)、预科(相当高中)、补习班(相当初中)三部分。本科设物理系、化学系、地矿系和生物系。1940年9月29日,延安的八路军卫生学校,奉命改为中国医科大学。医科大学的宗旨是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作风艰苦的现代医务工作者,毛泽东给14期学员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9]94}之后,194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建立了民族学院,这个学院包括了汉、蒙、回、藏、苗、彝、满等7个民族,学生总数约300人。1941年11月,抗大第三分校与军政学院三队和四队的高级干部合并组成军事学院。其任务主要是培养团级以上的中高级军事干部。

陕甘宁边区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另一件意义重大且值得高度关注的事情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大规模的综合大学——延安大学的成立。1941年8月28日,《解放日报》报道“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12]9}9月22日,延安大学举行了开学典礼,校长吴玉章发表讲话,他说“延大成立了,这是教育上的很大转变,中共中央以及边区政府在延安推行新的教育。中国学术和教育都很空虚不实际,这是很大的毛病。”即使在今天的大后方“教育仍然是无甚用处”,“目前我们要应付这个革命的时代,教学方法就感到不够,我党实行整顿学校,变成正规化,纠正不切实际习惯。”^[13]之后,1943年4月、1944年5月,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学院、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行政学院相继并入延安大学。延安大学由此设三院一系,即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学院、行政学院及医药系。

总之,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先后创建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行政学院、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中国女子大学、民族学院、军事学院、中国医科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学院、泽东干部学校、俄文学院、延安大学等10多所院校,^[14]这些学校与西北联大一样都是在抗日战争的战火硝烟中组建与发展的,它们共同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培养了大量各类有用人才并对战争胜利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

(二) 共同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布局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确立了框架

西北联大组建后,将现代高等教育制度与体系系统地引入了西北地区。从学科设置来看,涵盖了综合、文、理、法、农、工、医、教育等几乎全部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比如,国立西北大学有3院12系,形成了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地质学等完整的高等文理教育体系。后来西北医学院(汉中部分)、陕西省立商业专科学校、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等又并入西北大学。至1949年10月,西北大学成为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学科设置最为齐全的综合大学之一。再比如,西北工学院,是当时国内学科设置最为齐全的工学高等学府,有土木、矿产、水利、机械、电子、化工、纺织、航空、管理等9个系科。从学历教育层次来看,西北联大包括了从职业技术教育到专科、本科、研究生等完整的学历教育程度,可以说层次分明、类别齐全。今天在西北的西安交通大学,汇入了由西北医学院发展来的原西安医科大学以及由西北大学法商学院发展来的原陕西财经学院;西北工业大学汇入了西北工学院的大部分院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汇入了西北农学院的基础。至于西北大学则完全由国立西北大学演化而来,西北师范大学完全由西北师范学院演化而来。^{[15]6-7}此外,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东北大学等院校均与西北联大有直接渊源和传承关系。

而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于1939年7月7日,以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文学院的一部分组成华北联合大学。华北联合大学在延安成立后,随即向敌后挺进,三个月后到达晋察冀边区的阜平。截止抗日战争胜利,华北联合大学在6年时间里先后毕业的学生达8000人,共80多个班,连同培养一个时期即分配工作的干部,人数逾万。^[16]抗战胜利后,1948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将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1949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以华北大学等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大学。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而其前身则可追溯到1937年7月底在延安成立的陕北公学。与此同时,1950年在华北联大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1945年9月12日,由艾青、江丰率领的延安大学鲁艺“华北文艺工作团”从延安出发,赴张家口市,全团并入“华北联大文艺部”,北平和平解放后

该团随军入城,成为1950年创建“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的一直骨干队伍。^{[17]203}1945年10月间,党中央决定:延安大学的自然科学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行政学院的大部分,除自然科学学院大学部最老的两班毕业生,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到各个解放区工作,行政学院和校部预科的陕籍学员留在延安外,其余全部迁徙到东北办学。学员离开延安前,毛泽东接见了学校教员和主要领导干部,指出学校向东北转移的目的在于创办“新型的东北大学”。^{[17]204}在具体迁移的过程中,自然科学学院于1948年与晋察冀边区的北方大学工学院合并,改为华北联大工学院,1949年迁到北京,1952年1月1日改称北京工学院。

1946年春,去往东北道路打通,到达东北后的鲁迅艺术文学院和东北大学合并改为文艺学院。1948年沈阳解放后,将分散在佳木斯、牡丹江、哈尔滨的几个文工团集中起来,在沈阳恢复建立了“东北鲁迅艺术文学院”。^{[17]205}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中,在东北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基础上,分别建立了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和沈阳音乐学院。

1949年3、4月间,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常委会,会议决定:西安解放后,将延安大学从革命圣地延安迁往西安,改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18]517}6月10日,学校整体顺利到达西安,6月25日,迁至西安的延安大学总校与分校合并,正式改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西北民大”),并开始招生。^{[18]519}1953年3月28日,西北局决定将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改名为西北政法干部学校,1958年9月,改名为西北政法学院。1958年,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决定,在延安恢复重建延安大学。

总之,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与西北联大都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布局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今天中国的许多高等学校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东北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西北政法大学等与边区高等院校有着极为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不少高校始建时期的主要领导、骨干教师、学科专业设置基础,都来自边区,来自延安。

(三)为抗日战争与民族解放造就与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1937—1946年之间,西北联大与其子体国立5院校形成了505名教授、1489名员工的教职工队伍,培养毕业生近1万名,学生中涌现出了师昌绪、叶培大、傅恒志、史绍熙、吴自良、高景德、张沛霖、李振岐、赵洪璋、涂治、侯光炯、王光远、于天仁等杰出人才,^[19]为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与建设作出了应有

之贡献。例如师昌绪,1945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2010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吴自良,1939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曾获国家发明一等奖与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赵洪璋,1940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培育出我国小麦推广面积第一的“碧蚂一号”,毛泽东主席多次接见他,亲切地称他“挽救了新中国”,人们也把他和水稻专家袁隆平并称为“南袁北赵”。^{[15]9}再比如,玉门油矿最初开办时,除极少数人员由其他单位调来以外,大部分技术人员是来自西北工学院等校的毕业生。^[20]

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始终把培养与造就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的大批干部及各方面人才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的关头,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并强调“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21]256}从而不仅强调了教育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而且规定了教育必须为抗战服务的基本方针。5月8日,他在该次会议上又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再一次强调“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21]277}明确指出了抗日战争必须要培养和造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成千上万的优秀干部与人才,这给全党发出了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号召。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对教育在抗战中的重大历史责任问题又进行了阐述,指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必须“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22]1939年1月,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包括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作用及意义又进行了论述与强调,指出:边区实行国防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提高人民的文化政治水平,增强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而且要“培养抗战干部,供给抗战各方面的需要;教育新后代,使成为将来新中国的优良建设者。”^[23]

正是在党中央与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倡导下,边区高等教育不断发展、壮大,并且各高等院校通过创新教学制度、采取灵活办学方式、缩短学制学时以及“急用先学”等方法、措施,为抗日战争与民族解放“培养了成千成万分散在全国各抗日战线的干部。这是边区对中华民族伟大的贡献,是边区人民的光荣。”^{[24]247}据统计,抗战期间,仅抗大总校

及其各分校,为国家和民族就培养了20多万优秀的抗日军政干部。^[25]

二、西北联大与陕甘宁边区高等教育的差异与各自特色

西北联大与陕甘宁边区高等教育在创办及发展过程中,除了上述共同点之外,也有一些差异并形成了各自鲜明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西北联大在教学中高度重视对西北地区经济社会的考察与调研;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则强调教育为生产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的结合

西北联大与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在教学中都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但西北联大高度重视对西北地区经济社会的考察与调研;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则十分重视教育为生产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的结合。西北联大组建后,联大师生自觉将教学工作、学术研究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积极为抗战服务、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早在西安临大时期,为了使师生的教学科研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学校积极联系地方政府,共同解决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及面临的难题。如,矿冶系主任魏寿崑受陕西省建设厅委托,率学生到安康调研金矿情况,协同解决面临的问题;1937年12月,纺织工程学系全体教授率领本系一、二、三、四各年级学生,到西安大华纱厂参观该厂设施,了解企业发展状况;1938年1月24日,农学系畜牧组同学为“明瞭西安乳牛业经营情形起见”,由该系李正谊率领前往南门外小雁塔东西京牧场参观,对该场经营业状况及经营方针、乳牛饲养情形及繁殖方法等进行详细调查,以备咨询。^[26]除以上几院系外,学校还组织化工系师生赴咸阳酒精厂参观实习;地理系师生赴泾阳渠附近作农村调查;文理学院女生60余人由教员率领赴咸阳一带乡村参观,了解农村发展状况。另外,西北联大还对大西北进行广泛的科学考察与调研活动。比如,1938年3月,西安临大派员赴甘肃、青海两省考察,获取大量有价值资料;1939年7月20日至9月20日,联大第二次组成教授考察团,对甘肃、宁夏、青海三省进行考察,考察范围分为政治、经济及历史、地理两组,此次考察对于甘宁青三省之政治、经济、历史、地理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27]1942年夏,边政系杨兆钧与学生前往青海省循化县,对撒拉族语言、风俗、习惯、生活等进行考察,费时共70余天,对青海、甘肃的历史、种族来源、宗教信仰、人种特征、房屋建筑、陈设、饮食、通婚、娱乐、经济生活、语言文字、族史、教育等各方面进行了翔实的调研;1940年,国民政府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立。从1940年至1944年间,考察团考察了陕西、甘肃、青

海等省区,获得了丰富的文物资料。1943年,历史系教授黄文弼受西北大学委托第三次赴甘肃、新疆等地考察,他沿着河西走廊西行,先后考察了敦煌莫高窟及北疆、南疆,对西北边疆的考古工作起到了筚路蓝缕的作用,等等。通过科学考察与调研活动,联大为国民政府及未来西部开发建设战略的规划、实施,提供了一定的历史依据与智力支持。

边区高等教育的一个特点,也可称之为“中国教育上的一个新革命”,就是强调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毛泽东强调,边区必须推行新的教育,改变过去旧的教育方针与教育制度,因为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的目的就是用其理论来武装头脑及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正确的方法与态度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事实求是的态度,“而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28]⁸⁰¹毛泽东关于理论与实际联系的讲话精神,成为边区高等院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并且这一指导思想通过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在各院校及广大学生中得到具体而生动的展现,从而逐步实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的意义与作用。如,抗大所发生的生产运动,包括种菜、喂猪、养鸡、牧畜和出版事业等等。当时,生产运动在全校人员中风起云涌开展起来,“抗大每一个人特别是学员,深刻了解了生产运动的意义,它不只是经济上开源节流,帮助学校解决经费问题,改善各队自己的营养,使同学们自己多吃些可口的蔬菜与肥美的猪肉,而且更有伟大的意义,这教育着同学以刻苦耐劳的方法,锻炼同学艰苦卓绝的意志,它是由实践中去学习艰苦的工作作风的一种方法。”中国女子大学的同学们,“她们不但学习,而且从事生产劳动。”通过劳动“她们一样以不弱于男同志的英勇姿态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延安大学的学员“除了学习以外,还要参加生产劳动。一般是生产劳动占学习时间的百分之二十。这种生产劳动有手工业的也有农业的,有个人的也有集体的。”“一到了春耕农忙时间,这些‘学生哥’‘洋教授’就和农民一起扛起锄头上山去开荒种地了。”^[29]²⁰⁸⁻²¹⁰而自然科学院的师生,在1944年8月就“已打了碳15万斤”;同月,农业系则积极参加割青草压绿肥活动,3天就割青草达621斤,还进行

锄地等劳动;机工系的师生大部分参加了打铁组、钳工组、车床组、木工组,或到工厂去了,“现在全院都以卷入生产热潮了”。^{[29]217-220}总之,通过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使广大青年知识分子逐渐养成了劳动习惯和劳动观念,纠正了“万般皆下品”、“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错误观念,以更加昂扬的精神面貌从事工作与学习,从而更好、更有效地为抗战服务,为人民服务。

(二)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与西北联大相比较,另一显著特点是边区的高等教育均为干部教育性质

中国共产党一直十分重视干部教育与干部培养。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曾指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30]党中央到达延安后,1937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其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21]277}同年5月,刘少奇也呼吁:“我们要大批训练军事、政治干部。”^[31]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益严峻的战争形势,有计划地培养与教育各方面急需的干部就成为当务之急。所以,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实质或宗旨就是“干部教育第一”,即“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32]其目的是“训练千百万优良的抗战干部,培养将来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建设者,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24]1}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明确指出边区教育是“实行干部教育,培养抗战人才。”^{[24]60}延安大学创办之初即确定明确的教育方针与目的“本校以适应日益开展的西北形势需要,实施新型正规化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大量培养为人民服务的各项专业干部及普通干部。”^{[10]128}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其开宗明义指出“一切工作,包括国民教育工作在内,都须经过干部去做,‘在政治方针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如不把干部教育看得特别重要,把它放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等地位,就要犯本末倒置的错误了。”^{[33]162}为了加强对各学校干部教育的领导,中央在领导体制上做了一些调整,决定中央研究院直属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直属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军事学院直属军委参谋部;延安大学、鲁艺、自然科学学院直属中央文委。并强调各校主管机关,应把自己直属学校的工作,当作该机关业务的重要部分。不仅如此,中央还对各学校的干部教育作了具体而明确规定“甲、

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乙、中央党校为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丙、军事学院为培养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军事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丁、延大、鲁艺、自然科学学院为培养党与非党的各种高级与中级的专门的政治、文化、科学及技术人才的学校。”^{[33]149}

(三)就办学指导思想相较而言,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在教育教学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与同时期国民政府所办的高等教育包括西北联大在内而言,边区高等教育最为明显的特质之一就是在教育教学中注重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指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因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并进一步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34]532-533}1940年1月3日,中央书记处在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首要强调:“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33]32}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演讲中进一步指出“在现时,毫无疑问,应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34]706}同年3月9日,中央书记处在发布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再次强调了各类干部教育中马列主义理论课程的重要性,并“决定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今年(1940年——笔者)‘五五’为第一届节日”。^{[33]34-35}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重申“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28]802}边区高等教育中实施与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不仅在当时明确了边区高等教育的办学指导思想,使广大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普及与提高,更

为重要的是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中进一步加强与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经验。^[14]

总之,西北联大与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尽管办学指导思想、组织形式、教学制度、管理模式等有所差异,但都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同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不朽篇章。

参考文献:

- [1]“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1400.
- [2]西北大学大事记编委会,赵弘毅,程玲华. 西北大学大事记[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
- [3]陈剑脩. 西安临大校刊·发刊词[J]. 西安临大校刊,1937(1):1.
- [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1)[Z].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11.
- [5]本校城固本部举行开学典礼志盛[J]. 西北联大校刊,1938(1):7.
- [6]教育部. 国立中央大学等校设立师范学院办法[J]. 西北联大校刊,1938(3):8.
- [7]梁严冰. 西北联大的组建与分置[N]. 光明日报,2012-10-14.
- [8][美]埃德加·斯诺. 斯诺文集:第2卷[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217.
- [9]刘宪曾,刘端葵,等. 陕甘宁边区教育大事记[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 [10]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上册[Z].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 [11]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下册[Z].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 [12]陕公、女大、青干三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N]. 解放日报,1941-08-28.
- [13]延大举行开学典礼校长吴老宣布教育方针徐老讲政治与技术并重[N]. 解放日报,1941-09-23.
- [14]梁严冰.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高等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教育[J]. 党的文献,2017(2).
- [15]方光华. 为什么要纪念西北联大[J]. 休闲读品·天下,2012(2).

- [16]晋察冀边区教育阵地社. 抗战时期边区教育建设:上册[M]. 晋察冀边区:晋察冀边区教育阵地社,1946:126.
- [17]王云凤. 延安大学校史[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 [18]刘端葵. 从延安到西安[M]//延安大学回忆录.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 [19]方光华,梁严冰. 抗战前后国民政府的西北建设战略[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 [20]孙越崎. 我和资源委员会[M]//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商经济组. 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21-22.
- [21]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2]毛泽东论新阶段[M]. 延安:解放社,1944:74-75.
- [23]林伯渠. 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M]//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39.
- [24]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册[Z].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 [25]栗洪武. 陕甘宁边区教育史[M]. 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2:85.
- [26]农学系畜牧组同学参观西京牧场[J]. 西安临大校刊,1938(8):6.
- [27]本校校本部本学年第二学期第九次纪念周记录[J]. 西北联大校刊,1939(17):11-12.
- [28]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9]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 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G].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
- [30]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8.
- [31]刘少奇选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78.
- [32]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册[Z].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197.
- [33]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Z].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 [34]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高锐]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Northwest China and Shaanxi – Gansu – Ningxia Border Region

LIANG Yan-bing

(College of Marxism,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54, Shaanxi)

Abstract: Northwest China and the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Shaanxi – Gansu – Ningxia Border Region have added a glorious chapter to the histor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nd had a significant and far – reaching impact on higher education in New China. Its commonplace is the formation, founder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nti – Japanese war; they both have laid the foundation, made a contribution for the layout and development of new China's higher edu-

cation; and created and cultivated a large number of outstanding talents for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national liberation. The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orthwest China and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has formed their own distinctive features in the process of running the university: Northwest Universit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northwest economic and social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in the teaching; the higher education in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emphasizes the services of education for the production and the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and labor production; a significant fea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is to adhere to the approach of "cadre education first"; and put the guidance of Marxist-Leninist theory in the first place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Key Words: Anti-Japanese War; Northwest China;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Higher Education

(上接第28页) 难杂症”仍必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正确应对和科学化解,也需要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积极获取可供学习、借鉴和利用的观点、思想和方法。但这绝不是从理论上嫁接和糅合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所能实现,而是必需创造出具有民族文化特色并能彰显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时代文化符号。细思其理则不难发现:这些文化符号也富有深厚的仁道精神,其都是对人本身的关怀、对自然和社会变化发展规律的探究和遵循。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围绕当代社会状况和国际形势产生了各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思潮,然而绝大部分却在现实的拷问中分崩离析。可是传统文化的魅力却在这个思想大潮的碰撞和交融中逐步彰显了出来,并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和深省。当代新儒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其明确指出儒学的核心价值“仁”是源头活水,是面向全人类未来的普世价值。^[1]“仁”虽是源

头活水,但在转化为普世价值的过程中绝不是通过简单的文化自发延伸,而是在遵循“道”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是“仁”与“道”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 [1] 杜维明. 儒家的“仁”是普世价值[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3).
- [2] [汉]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161.
- [3] 袁珂. 山海经校注[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 14-15.
- [4] 许建良. 老子道家仁学论[J]. 桂海论丛, 2015(4).
- [5] 朱谦之. 老子校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22.
- [6] 张岱年. 中国古典哲学范畴要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155.
- [7] 成云雷. 先秦儒家社会秩序建构中的仁道价值及其哲学依据[J]. 中国哲学史, 2012(1): 16.

[责任编辑 刘国荣]

Rendao: the Logical Origin of Chinese Culture

LEI Yun-fei^{1 2}

(1. College of Marxism,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54, Shaanxi;

2. Commercial College,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an 710122, Shaanxi)

Abstract: Rendao is the logical origin of Chinese culture. Contention of hundreds schools of thoughts before the Qin dynasty, basic thoughts belonging to different schools were developed from Rendao; Eve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Rendao was still the basic idea that ran through. In the progress, Ren and Dao were alternated between ups and downs, showed and hid, but rolled into one finally. Now, Rendao is still the basic thoughts and value orientation throughout the progres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Rendao; culture; origin